

“唐诗学”研究及其学科建设

丁 放

内容提要 唐诗是中国诗歌的精华，作为研究唐诗的学问——唐诗学，也逐渐得到学界关注，但是如果与“《诗经》学”“《楚辞》学”“龙学”“红学”相比，在学科体系建设方面尚有欠缺。作为具有现代学术意义的“唐诗学”，是近代确立的，并且在新时期以来迅速发展。唐诗文献学在大作家文集整理注释、《全唐诗》增、修、注、新编等方面，成绩斐然，但二、三流诗人诗集的整理却相对落后。唐诗文艺学方面，唐诗艺术研究虽有一些闪光的成果，但创新性成果偏少；唐代诗论研究仍有很大提升空间；唐诗与史学、哲学、艺术学关系之研究进展较快；唐诗学研究应坚持文学本位、史学思维与文化学视角，应当科学地划定“唐诗学”学科内涵与外延，确立“唐诗学”建设的基本框架与主要内容，坚持“守正创新”，构建既有民族特色又能自立于世界优秀文化之林的唐诗学学科体系。

关键词 唐诗学；唐诗文献学；唐诗文艺学；文学本位；学科体系

唐诗研究，从唐诗诞生之初即已开始，历经千余年的演进，在不少领域已经取得重要成果。

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1]这一重要讲话同样是唐诗学研究的指导方针，我们研究唐诗学，既要立足于文献、重视文本，又要加强理论，细读作品，构建具有当代意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话语权并且能紧跟时代潮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完整的学科体系。

一 “唐诗学”学科溯源

“诗学”一词在我国古代即已出现，并有自己的生成发展史。作为“《诗经》学”之简称的“诗学”，已经成为共识。作为诗歌学术语的“诗学”，约始于晚唐五代之际。如晚唐郑谷《中年》诗曰“衰迟自喜添诗学，更把前题改数联”^[2]；宋人

陈造曰：“本朝东坡、黄、陈其正派，予亦韵类坡诗千三百篇，并黄、陈诗皆能暗诵，然诗学终愧古人，又何也？”^[3]明人张鼐《重刊诗林广记序》曰：“蒙斋蔡先生《诗林广记》会萃晋唐及本朝诸家之诗，长篇短章，众体咸备，复取大儒故老佳话附录各篇之下，单言只句，品议无遗，诚诗学之指南也。”^[4]后世也有不少类似的表达。上述“诗学”术语的涵义及所应用的对象和范围，较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传统诗学重诗艺、重修辞的特点，与现代的“诗学”一词，有同有异。当代学者认为中国诗学包括六大内涵：“一、有关诗歌的基本理论和诗学基本范畴。”“二、有关诗歌形式和创作技巧的问题。”“三、对于中国历代诗歌源流、或曰历代诗歌史的研究。”“四、对于历代诗歌总集、选集、别集或某一具体作品的研究。”“五、对于历代诗人及由众多诗人所组成的创作群体的研究。”“六、对于历代诗歌理论的整理和研究。”^[5]“唐诗学”研究范围也大致相同。实际上，“唐诗学”研究，在唐代即已开始。唐代及宋以后的学者，通过选、编、注、考、评、点、论等形式，对唐诗进行了多种维度的研究。这些研究几乎触及唐诗学所有的内容。

然而这种传统的唐诗学研究，与现代意义上的“唐诗学”研究存在明显差异，正可与现代诗学观念交流互通，以资当代诗学建构之用。

现代意义上的“唐诗学”概念，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一批中青年学者提出的。1982年傅璇琮在全国第一届唐代文学研讨会上首先提出“唐诗学”的概念，提议创建唐诗学学科，得到了与会同仁的积极响应。傅璇琮身体力行，先后出版了《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等开创性著作，组织了全国一批学者，相继推出了《唐才子传校笺》《唐五代文学编年史》等唐诗学研究的奠基之作。同时，傅先生还提携、培养了一批从事“唐诗学”研究的青年学者。如李浩的唐代园林与唐诗研究、戴伟华的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等，均受其指点与关注。陈伯海在《唐代文学研究》第一辑上发表了《唐诗学史之一瞥》的长文^[6]，1988年，陈伯海《唐诗学引论》出版，对唐诗的性质、渊源、流变、体式、学术史诸范畴，作了宏观而综合的讨论，为“唐诗学”搭出一个基本的框架。其后他又出版了《唐诗书目总录》《唐诗学史稿》《唐诗汇评》《意象与唐诗艺术》等著作，并最终汇集为“唐诗学书系”，为唐诗学研究作出重大贡献。1986年，郭扬撰成《唐诗学引论》一书，讨论了唐诗的一些理论概念、基础知识以及分期、风格、流派、名家、诗话诸方面，从宏观上将“唐诗”作为一种现象来把握，并期望唐诗研究真正成为一门“唐诗学”。1998年，我国台湾学者蔡瑜出版《唐诗学探索》，包括“唐诗律化的理论过程”“唐诗学中意境论的形式”“唐诗时代意识的递嬗”“声音之道与政通”等问题。此外，朱易安《略论唐诗学发展史的体系建构》一文，探讨了唐诗学的存在基础、形成及其意义，对唐诗学的建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黄炳辉《唐诗学史述论》，讨论唐诗学史的史学性质、诗学性质以及唐诗学的发展走向，提出建立文化唐诗学。

研究“唐诗学”，首先要明确其研究对象和范围。“诗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是指研究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各种文学样式的学问或学科的通称。这样的“诗学”实际上是文学理论，或称文艺学。这种观念主要来源于西方，代表性著

作就是亚理斯多德《诗学》、贺拉斯《诗艺》。而狭义的“诗学”，指研究诗歌理论和诗歌批评的学问和学科，这种理解在我国的文学研究（尤其是古典文学研究）领域更为多见。从现代学科建设的发展潮流来看，唐诗学的学科体系，可以也应当突破传统观念，而采取一种更有包容性的态度，不但包括对唐诗作品的分析与理解，而且包括相关唐诗理论的探讨，还包括唐诗影响史研究；不仅研究唐诗本身，还关注其历史背景；不仅关注唐诗及其理论的哲学背景，还注意其与书法、绘画、音乐、建筑等其它艺术形式的关系。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给唐诗学下了一个简单的定义：唐诗学是研究唐诗（及唐代诗论）的学问。唐诗学是以文学史研究与批评史研究密切结合为前提、以唐代诗歌作品研究与诗歌理论研究为核心内涵、以唐诗学史、唐诗接受史、唐诗文化学、域外唐诗学研究为其辅翼的学科。如此理解，可以基本涵盖唐诗学研究的各个层面，包括文献整理与研究、文艺学研究两大板块，下文分别论述之。

二 唐诗文献学：唐诗及相关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唐诗文献学”运用文献学基本理论，在全面搜集、梳理历代唐诗学文献的基础上，研究唐诗学文献产生及发展情况，主要包括四大部分：一是唐诗目录学，研究唐诗目录的分类、演化、特点、使用方法等。随着唐诗学目录专书的问世，唐诗目录分类愈加细密和科学。二是唐诗版本学，探讨唐诗版本的类别、分布、流变、特点，唐诗刻本、抄本评介等。三是唐诗校勘学，研究唐诗校勘的目的、类别、原则、体例及辨伪方法。唐诗校勘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宋人校勘唐诗“求真”，明人“求善”“求美”，清人兼备宋、明。四是唐诗编纂学，研究唐诗的编纂原则、编纂方法，如总集、别集。选集、选注、校笺，笺注、汇编、辑佚、辑注等的编写手段以及体例要求等。

研究唐诗文献学，应当从传统的文献学一目录、版本、校勘的角度着眼。虽然从两《唐书》的经籍志、艺文志到《四库全书总目》著录了大量的

唐人总集与别集，但是古人并没有专门的唐诗目录学专书，今人万曼《唐集叙录》是我国第一部唐集目录专著，该书著录了有传本的唐人诗集、文集、诗文合集共 108 家，“作者对这些唐人别集的著者、书名、卷数、成书年代、编辑者、刊刻者、收藏者等各项均按时代先后作了较为详尽的介绍。其间，对于各集的版本源流、编次体例以及该书在唐、宋、元、明、清各朝直至近代的流传、演变（存、佚、阙、未见）等情况考述尤多，功力不小”^[7]。但此书收录诗人别集的范围有限，有些书并非出自目验，有明显的局限性。陈伯海踵事增华，广录唐集，成《唐诗书目总录》，共录唐人诗集约 4000 种，分为总集、合集、别集、评论及资料四类，注明了书名、卷数、作者、朝代及各种版本，“此书价值在于大致理清唐诗学的‘家底’，可用为进入唐诗学学科领域的入门向导”^[8]。此书基本建立了唐诗学的目录体系。唐诗别集的目录版本问题，学界也有不少研究成果，其中成果最丰富的是杜诗目录版本研究^[9]，其余如李白、王维、白居易等人文集的版本问题，都有专门的研究成果。对唐诗进行校勘与注释，也是唐诗学的重要任务之一。宋人即有李白、杜甫全集的注释本，嗣后各代，相继出现了一批唐代诗人作品的全注本或选注本，清人重考据，唐代不少诗人都有不止一种注本。20 世纪后半叶，唐人诗集注本不断增多，数十位大诗人的诗有了新注本，有些不仅有前人的旧注重印，更有一种至多种新注问世，校注水平也不断进步。其中李白、杜甫、李商隐诗歌的校注整理，是唐诗整理的典范。著名学者詹锜《李白诗论丛》《李白诗文系年》出版于 20 世纪 50 年代，对李白诗集的版本、李白的家世、系年、游踪、交谊均作了深入的研究，颠覆了前人的诸多成说。瞿蜕园、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即大量吸收了《李白诗文系年》的成果。詹锜又带领弟子数人，成《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将李白诗集的整理工作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是当代李白研究的一座丰碑。郁贤皓在詹锜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深入研究，对李白其人其诗作了多方面的考证，并最终撰成《李太白全集校注》。安旗主编的《李白全集编年笺注》在李诗编年方面亦有创获。由萧涤非主持、张忠纲接力完成的《杜甫

全集校注》，则是集前人杜诗注释之大成的名著。2021 年刘跃进、徐希平教授主编影印出版了《杜集珍本文献集成》（宋元卷第一辑），该丛书拟对存世杜集文献作竭泽而渔式的清理，目前最先影印出版的八种，以宋元刻本为主，尤其珍贵。晚唐大家李商隐之诗号称难解，元好问有“诗家总爱西崑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叹，刘学锴、余恕诚师以毕生精力力注释、研究李商隐，著有《李商隐诗歌集解》《李商隐文编年校注》《李商隐资料汇编》《李商隐传论》《李商隐诗歌接受史》等，对李商隐的生平身世、诗歌内容与艺术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均有超越前人的重大突破，学界认为他们的研究改变了李商隐诗歌的历史地位，过去的文学史著作论李商隐，通常只列一节，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将李商隐列为专章。中华书局陆续出版了唐代一批大诗人的研究资料汇编，除李商隐外，还有李白、王维、杜甫、韩愈、白居易等，尽管有个别汇编错误偏多，为人诟病，但毕竟为这些大诗人研究提供了相对完整、系统的资料，功不可没。值得郑重推荐的是陈才智教授编纂的《白居易资料新编》，字数为原中华书局版《白居易资料汇编》的 20 倍以上，材料相当丰富，校对精严，后出转精。唐诗全部文本的整理，也一直为学者关注，明人胡震亨有《唐音统签》，明清之交吴琯有《唐诗纪》^[10]、季振宜有《唐诗》，康熙年间，曹寅等人奉旨编纂、刊刻了《全唐诗》，集当时所存唐诗作品之大成。《全唐诗》存在收诗不全，有不少遗漏、误收、重出、注释错误、小传疏舛、体例不纯等不足。当代学者对《全唐诗》多有补正，王重民、孙望、童养年有《全唐诗外编》，陈尚君则继续增补，成《全唐诗补编》，佟培基有《全唐诗重出误收考》。新时期以来，重编《全唐诗》的呼声很高，陈尚君有新编《全唐五代诗》之举，此书删除清编《全唐诗》误收互见之诗四千余首^[11]，新增逾八千首，共存诗近五万四千首，诗人数超过三千五百人。同时，周勋初等人主编的《全唐五代诗》出版了初、盛唐部分，这两部书的出版，将为今后的唐诗学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全唐诗》的注释方面，陈贻焮、陈铁民邀约国内百余位学者共同编著的《增订注释全唐诗》，为全部唐诗作了简明的注释，近

年陈铁民主持修订此书，于2023年2月正式出版。唐诗在流传、定型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异文，比如最近被大众关注的崔颢《黄鹤楼》“昔人已乘黄鹤去”，“黄鹤”一作“白云”，孰是孰非，通过异文研究，或可探寻新的答案。此类异文问题，在整部唐诗中，是成千上万、数不胜数的，异文研究也值得关注。

三 唐诗艺术学：艺术研究、诗学理论、 唐诗接受史

研究唐诗，艺术研究是核心。唐诗之所以成就超越唐前代且为后世诗人所仰视，高超的诗歌艺术是其根本。

从近现代学者闻一多《唐诗杂论》，到林庚《唐诗综论》，再到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12]，是一条关注唐诗艺术的一脉相承的主线。闻一多对“初唐四杰”、孟浩然诗歌的精妙体悟，林庚关于唐诗“少年精神”“盛唐气象”的举重若轻的描述，久已为后辈学者所称道。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以唐诗为主要研究对象，提出诗歌艺术分析要从语言入手，再到意象、意境与风格，进一步则关注哲学、宗教、绘画、音乐与诗歌的关系，此书上编讨论诗歌艺术理论，下编如《王维诗歌的禅意与画意》《论李杜诗歌的风格与意象》《李白的宇宙境界》等文，是对上编理论的具体阐发。可惜这类注重艺术的研究成果难乎为继，目前的唐诗研究，偏重于生平考证、内容分析，对异彩纷呈的唐诗艺术较少留意，这是唐诗学研究的一大缺憾。社科院文学所主编的《唐代文学史》对唐诗艺术有所探讨，但由于成书较早，观点与材料均有些陈旧。历代“唐诗艺术学”的理论资料相当丰富，有待深入研究与吸收，如历代诗话对唐诗艺术体式与题材的探讨、语词与命题的选择以及解读方式等等，均有独到的见解。唐代诗话多为诗格类著作，主要记载并讨论唐人诗法（章法、句法、字法）、用典、艺术风格等方面的特点，对唐诗艺术学有一定贡献。宋代诗话繁兴，北宋欧阳修《六一诗话》、司马光《续诗话》等，虽然是以记录“资闲谈”的材料为主，但不乏唐诗艺术的讨论。南宋

严羽的《沧浪诗话》，则有很强的理论色彩，重点讨论唐、宋诗的优劣，推崇唐诗，批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13]的宋诗，肯定李白之“飘逸”、杜甫之“沉郁”，要求学诗者“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14]，对王、孟的闲适淡远也十分欣赏，主张以盛唐为法，对叫嚣怒张的中晚唐诗深致不满。姜夔《白石道人诗说》亦提倡作诗学唐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魏庆之《诗人玉屑》为汇编性诗话，将唐宋许多种诗话汇于一炉，其中包含了大量唐诗艺术研究的内容。明代是诗话的全盛期，也是唐诗艺术学发展史上的关键时期。明人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如杨慎扬李抑杜，王世贞抑李扬杜，都以盛唐为指归；“公安派”“竟陵派”则以中晚唐为效法对象。清代诗话，蒋寅《清诗话考》所著录，即达近千种。这些诗话或总结中国诗歌的发展规律，如叶燮《原诗》以树木生长为喻，认为诗起源于《三百篇》，至唐代达到极盛，至宋代而极其变，宋以后之诗，如花开花落，缺少新变。王夫之则着重讨论诗歌的情景关系。再如清朝的“四大诗说”：王士禛“神韵说”，高度推崇盛唐王、孟诗“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美；沈德潜“格调说”，标举李、杜、韩诗之高格。袁枚倡“性灵说”，主张诗歌要有性情，反对沈德潜之拘守格调，过尊李杜，指出“唐以李、杜、韩、白为大家，宋以欧、苏、陆、范为大家”。^[15]翁方纲的“肌理说”，要求诗歌既要雅正又要华丽，认为杜诗最合这一标准。唐诗独特的艺术品格、唐音宋调之分、唐诗诗艺的渊源与流变、唐诗诗体的演变、唐诗与其它文体关系、唐诗审美特质、流派界定等问题，唐诗风骨、兴寄、气象、意象、意境、韵味等艺术范畴研究，也是唐诗艺术学研究仍需深入开拓的领域。复旦大学主编的《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王运熙、杨明撰）等著作，对唐代诗论研究有重要贡献。盛行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唐诗鉴赏热期间，出现了以《唐诗鉴赏辞典》为代表的大量唐诗鉴赏类著作、文章，多谈唐诗艺术，对普及唐诗，当然是有作用的，但此类文章良莠不齐，多凭主观印象发挥，容易流于肤浅，阅读时要善于辨别。

对唐诗的接受，在唐代即已开始。历代学者通

过选诗、品藻、述事等形式，反映出他们对唐诗的理解和审美接受。20世纪80年代初，即有部分唐诗研究者触及了唐诗接受史研究领域，如陈尚君《杜诗早期流传考》、周勋初《从“唐人七律第一”之争看文学观念的演变》等。1980年代，接受美学被引进，唐诗接受史研究遂成为一时的热点，出现了一系列论文、论著。陈文忠《走出接受史的困境——经典作家接受史研究反思》一文，将唐诗经典的接受史概括为五个方面：即经典地位的确立史、经典序列的形成史，艺术风格的阐释史，艺术典范的影响史、人格精神的传播史^[16]。

对唐朝著名诗人的接受研究成果较多。有的是按时间顺序评述诗人在历代的接受状况，如蔡振念《杜诗唐宋接受史》，依次评述了唐代大历至宋末诗人对杜诗在接受。有的是多维历时结构：如我国台湾学者杨文雄《李白诗歌接受史》分别评述普通读者、诗评家和作家对李白诗歌的接受。刘学锴师《李商隐诗歌接受史》包括历代接受史、阐释史、影响史三大部分，首先论述了一千一百余年李商隐诗在接受历程，然后对历代种种令人眼花缭乱的纷歧作出独到的阐释，其中对《无题》《锦瑟》《嫦娥》等诗的阐释，多发前人所未发。影响史部分，先论述宋玉至杜甫、韩愈、李贺对李商隐的影响，后论述李商隐对晚唐至清诗的启发、对唐宋婉约词的影响等。尚永亮《中唐元和诗歌传播接受的文化学考察》也是一部功力深厚的唐诗接受史研究专著。还有一批青年学者以唐代大诗人接受史为个案出版了专著，兹不一一列举。

对唐诗名篇的接受研究成果颇丰。前辈学者程千帆《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一个醒的和八个醉的》虽未用“接受史”之名，却具其实。陈文忠《〈长恨歌〉接受史研究》《唐人青春之歌走向顶峰之路——〈春江花月夜〉1300年接受史考察》，尚永亮《经典的沉寂与发现——李白〈古风〉唐宋接受史论略》等，既是对程氏方法的继承，又加入新的理论与新的方法。

唐诗接受研究仍存在不少问题：如接受史与学术史的界限不清；对名家名篇的研究，往往是按照朝代罗列其对后世的影响，对其接受角度及原因则缺乏深入的分析；很多研究停留在资料的排比、梳

理和解释之中，缺少问题意识。理论与作品实际结合不够，时有两张皮的感觉。相较唐诗研究的其它领域，唐诗接受史研究仍相当薄弱，亟待展开更加深入而系统的探讨。

四 文学本位、史学思维 与文化学视角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提出“文学本位、史学思维与文化学视角”三结合的编写原则，这也为我们研究唐诗学提供了很好的借鉴^[17]。这其实是一种综合研究的方法，这种方法由外及内、由表及里，对唐诗学研究及唐诗学体系建立有相当大的启发意义。所谓文学本位，首先是指上文所说的唐诗作品研究、艺术学研究、诗论研究、接受史研究等等。史学思维是指唐诗学研究必须从基本史实出发，尊重历史、敬畏历史，如诗人生平、系年与创作之关系，即所谓知人论世，即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世纪50年代，林庚敏锐地提出“盛唐气象”“少年精神”等深得唐诗艺术三昧的观点，随即遭到不公正的批判。如今，这种左倾思潮早已没有市场，但“文学本位”的观念尚不牢固，唐诗艺术研究仍未受到应有的关注，如唐诗的风格、流派特点（流派研究如元白诗派研究、韩孟诗派研究有一些成果，所谓“山水田园诗派”“边塞诗派”需要重新定位）、时代特色、重要诗人诗歌艺术的独创性贡献、唐诗的意象、意境、格调等方面，唐宋诗之争问题、唐宋转型问题等，均未有深入透彻的研究，唐代诗论尤其是明清时期有关唐诗的理论，更有许多待开发的余地。唐诗学研究与史学研究结合较为成功，唐史研究的许多新成果、新发现都在唐诗研究领域得到运用，如在诗人生平考证方面成果丰硕，像“贞观之治”“开元之治”与唐诗，“安史之乱”与唐诗，“牛李党争”与唐诗等，研究均较深入。在特殊时期，唐代文学研究多有不符合历史真实的违心之论，如讨论文学作品，多谈其阶级性、人民性，片面肯定暴露文学等；文革期间则大谈“儒法斗争”，将杜甫、韩愈等人划入儒家，将李白、柳宗元、刘禹锡、李贺等人划入法家，实际上将文学研究变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就是极其荒

唐的。有些观点竟流传至今，需要拨乱反正。

笔者曾在袁行霈师率领下，以盛唐诗人与政治的关系为研究视角，对唐玄宗、玉真公主以及张说、张九龄、姚崇、宋璟等贤相，李林甫、杨国忠等奸相与唐诗的关系作了深入系统的研究，且对盛唐官吏诗人、布衣诗人在唐诗发展史上的作用进行讨论，曾发表《唐玄宗与盛唐诗坛——以其崇尚道家与迷信道教为中心》《玉真公主考论——以其与盛唐诗坛的关系为中心》等文章，结集为《盛唐诗坛研究》一书，收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其基本作法是既坚守文学本位，又尊重历史，且联系哲学、艺术、社会学来立论，坚持守正出新，实事求是，获得了学界的认同。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对中晚唐一批诗人生平作了具体而详尽的考证。傅氏主编的《唐才子传校笺》则对辛文房《唐才子传》中的398位诗人，一一加以考证。周祖谟《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周勋初《唐诗大辞典》、卞孝萱《唐代文学百科辞典》亦收入大量唐代诗人。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和《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为翰林学士这一特殊的诗人群体作了专传。上世纪70年代末，皇甫烽发表《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初步讨论了科举考试与唐诗繁荣之间的关系。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等，以更深细的文献考证，从更广阔的视角研究唐代文学与科举之间的关系，论证了唐诗繁荣的一个重要而特殊的原因。对诗人生平进行深入、系统考证的成果，当数年谱。如清人王琦的《李太白年谱》，近人闻一多《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詹锳《李白诗文系年》、朱金城《白居易年谱》等，尤其是詹《谱》将李白生平活动轨迹与诗文创作完美结合，最富创见。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实以诗歌编年为主。吴在庆、丁放、曲景毅等人著《唐五代文编年史》，体例与傅著相同，主要为唐文系年，也是史学思维的体现。近年来，敦煌文献、地下文献及域外汉籍文献，越来越多地引起学界重视，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张锡厚《全敦煌诗》都是优秀的成果。20世纪以来，出土了数以万计的唐代墓志，这些材料中，与诗人有关者不少，如著名的王之涣墓志、韦应物家族墓志

等。胡可先、杨琼撰有《唐代诗人墓志汇编》，专收新出土的唐代诗人墓志，且加以辨析。胡可先《新出土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利用石刻文献，从一个新的层面研究唐代文学家族（主要是诗人家族），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唐代文章与唐诗关系密切，有不少作品甚至是诗文合一的，如王勃《滕王阁序》及诗，陈子昂《修竹篇序》及诗，白居易《长恨歌》及陈鸿《长恨歌传》等，均为著例。唐代史学家的诗学观集中表现于唐及宋初人所作的诸史文苑传（文学传）的序、论、赞里。两《唐书》中的诗人传记等文献，材料丰富，对研究唐诗有重要价值。唐代的野史笔记可为唐代正史之补充，亦为唐诗研究的生动素材，包含着唐代诗人生活与创作的许多细节。这些笔记，已有一部分新式标点本。再如《太平广记》中收录了大量唐代笔记，存世的版本甚多，但迄今为止只有中华书局校点本，缺少运用多种版本进行校勘的本子，更没有高水平的校注本。元人陶宗仪《说郛》一书中也收录大量唐代笔记，而此书只有影印本，连排印本都没见到。

唐诗的形成，与唐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潮、哲学、宗教、民俗、艺术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近代以来，学界着眼于研究外来文化对唐代文学的影响，如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罗香林《唐代文化史研究》、李斌城主编《唐代文化》、徐邦达《唐代文化史》等。唐代思想文化对唐诗的影响也备受关注，如邓小军《唐代文学的文化精神》、刘顺《中唐文儒的思想与文学》从宏观的角度讨论唐诗与儒学的关系。孙昌武著有《唐代文学与佛教》《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禅思与诗情》等，他认为佛教影响了唐代不少诗人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唐诗的创作主题、唐诗的语言与修辞等等。陈允吉对唐诗作家、作品从佛教的角度进行深入解读，著有《唐音佛教辨思录》《佛教中国文学溯论稿》等，其中对王维、贾岛、李贺诗与佛教关系作了溯源式探讨。中生代学者张伯伟、周裕锴及青年学者李小荣、张勇等人的佛教与唐诗关系的研究，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道教与唐诗关系方面，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孙昌武《道教与唐代文学》等颇有价值。

音乐与唐诗的关系，以任半塘《唐声诗》为代表，其弟子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研究》《唐代酒令艺术》等，沿着乃师的道路继续前进。绘画、宗教与唐诗的关系，以袁行霈《王维诗歌的画意与禅意》为代表。陶文鹏、韩经太论诗画关系的系列论文也颇有见地。

五 “唐诗学研究”的学科建设问题及基本设想

“唐诗学”作为一门学科，自上世纪80年代提出以来，学科建设一直处于探索阶段。

本文从学科溯源、唐诗文献学、唐诗艺术学、唐诗文艺学、唐诗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学科建设等方面展开讨论，力求从整体上把握唐诗学的基本脉络。因为学科溯源是正名，文献研究是基础，文艺研究是提升，方法视角是路径，学科建设是目标。今后的唐诗学研究，应当尽力综合各个层面、构建一个立体的研究空间，逐步完成唐诗学学科体系的建设。

研究唐诗学，首要的是关注唐诗学研究的意义和理论价值。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18]这段话既是我国未来文化建设的指导方针，也为唐诗学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

唐诗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品，是五千年文明史上诗歌发展的顶峰，放在世界文学之林，也是一颗最为璀璨的明珠。研究唐诗学，必将有助于提高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我们一定要紧扣时代脉搏，适应社会需要，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珍惜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诗歌艺术遗产——唐诗，既要进行专业方面的研究，从文献出发，上升到理论，对唐诗深刻的思想内涵、深湛的诗歌艺术、丰富的诗歌理念，作进一步深入挖掘，不断推出学术精品。同时，唐诗学研究要走出象牙塔，面

向大众，以纸质作品、网络作品、音像作品为媒介，将唐诗介绍给广大读者，使得广大群众通过学习唐诗，能充分理解其中体现的朝气蓬勃乐观向上的青春活力、直面苦难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富于同情的人道主义精神、嫉恶如仇的浩然正气、热爱自然的审美情趣，以及优美绝伦的诗歌语言、精严规整的格律形式、波澜壮阔的气势、形态各异的诗体、变化莫测的艺术手法、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而这些正是中华文学艺术魅力的集中的、爆发式的展示。我们的唐诗普及工作，既要为中外大众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鼓励人们积极向上、善良乐观，又能获得令人愉悦的审美享受。同时，这种普及也可为当代诗歌创作提供借鉴。

将唐诗进一步介绍到海外，是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题中之义。早在唐代，唐诗已在朝鲜、日本、越南等亚洲国家广泛传播，且对这些国家的诗歌创作、文人生活、社会审美心理产生重大影响，这时的唐诗是以汉籍形式传播过去的，唐诗遂成为东亚各国学习、追慕、仿作的对象。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李白、李贺、白居易、李商隐等人的诗歌，则开始不断被译成英文等，并对当时欧洲诗坛产生影响。近世以来，李白等人的诗歌在美国也有很高的知名度。国内的唐诗研究成果，则只有极少部分被译为英、法、日、韩等国文字，唐诗作品被译成外文的数量也偏少，这大大制约了中华文化向外的辐射力。如何花大力气将唐诗及其研究成果译成外文（国家社科基金外译项目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向海外唐诗爱好者作广泛宣传，是我们下一步应当做的工作，做好此项工作，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增强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大有好处。

唐诗学的学科建设，还应重点关注以下问题：

首先，坚持正确研究方法。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实事求是，合理运用我国古代文论的方法，如知人论世，以意逆志，比兴寄托等，提炼出唐诗学的重要概念，如意境、意象、兴象、风神、格调、神韵等，并适当借鉴域外理论与方法的合理部分，在更为宽广的学术视野中提升唐诗学研究的学术品格。如借鉴阐释学方法解释文学史现象，运用

新批评派文本细读之法对唐诗作条分缕析，用符号学、意象学等方法解析唐诗文本，都有助于唐诗学研究。不过，运用这些方法，一定要联系唐诗文本及其理论传统，切不可望文生义，随意发挥。如接受美学理论前些年颇受追捧，运用此理论，也产生了一些成果，不过真正能运用这一理论解决唐诗学研究问题的成果并不多，往往流于浮光掠影，徒具一个新的标签而已。

其次，继续加强文献研究，建立唐诗文献资料库、数据库。如唐人全部别集的整理出版，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全唐文》本有许多遗漏，近百年新发现的唐代碑刻、石刻、敦煌文献、域外文献数量巨大，因此《全唐文》亟需重编，历代关于唐诗的评论材料深不见底，当代学者的研究论文、论著不断问世，这些资料仅凭个人力量难以穷尽，需要利用现代电子工具，将各类唐诗学资料汇为一炉，且以开放的形式存在，可以不断更新，犹如源头活水，方便读者使用。

其三，加强文学史研究与批评史研究的紧密联系。长期以来，文学史研究者，多专注于作家、作品研究，如诗人生平行事、作品真伪优劣、作品基本内容和艺术特色、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等。批评史研究者，多留意诗歌批评的概念、范畴等理论问题，不太关注具体的作家作品，这就形成了前者偏于浅，后者流于空的局面，不利于学科的发展。研究文学史的人要多关注理论，研究批评史的人要多熟悉作品，经过两方面的共同努力，方可促进唐诗学的发展。可以借鉴的例子是罗宗强、袁行霈的研究。罗著有《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等，袁著有《中国诗学通论》（后改版为《中国诗学史》），两位的著作都立足于打通文学史与批评史的界限，将作品与理论融为一体。他们的作法，为唐诗学研究提供了良好的范例，指出了一条重要的途径。

其四，加强唐诗的物质生活研究。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指出：“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

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19]过去研究唐诗，偏重于从精神层面入手，有“概念先行”的毛病，如讨论唐诗的爱国主义精神、报国杀敌的壮志、模山范水的雅兴、高蹈出世的情怀等，较少留意人间烟火，在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时代，也只关注那些描写民生疾苦、暴露社会阴暗面的诗作，视野较为狭窄。实际上，无论民族，不分地域，不分阶层，都有丰富、鲜活而又脚踏实地的日常生活，如衣食住行、读书漫游、从军出仕、婚丧嫁娶、高居庙堂、隐居山林，都在唐诗中有生动具体的反映，如唐诗与长安、洛阳、扬州、益州，唐诗与边塞，唐诗与江南，唐诗与丝绸之路，唐诗与长江、黄河、大运河、淮河，唐诗与名山大岳等，研究这些内容，对我们立体地了解唐诗大有帮助。

其五，加大唐诗选本的研究与编纂力度，这是普及唐诗的关键。唐诗选本，在唐朝当代即已出现，唐诗选本存世者数量众多，孙琴安《唐诗选本提要》即著录600余种，存世者达400多种^[20]。詹福瑞、陈红彦主编的《历代唐诗珍稀选本汇编》（唐宋金元卷）共收善本25种、63部，为研究早期唐诗选本的面貌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现存的唐诗选本经过整理者，仅《唐诗鼓吹》《唐诗品汇》《唐音评注》等寥寥几种，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唐诗选本未经整理，多深藏海内外图书馆、博物馆及收藏家手中，如明末著名唐诗选本《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21]《唐诗归》，清代《唐宋诗醇》等，均需作深度加工。应当在借鉴古今选本的基础上，推出一种或数种具有新时代特色的唐诗选本，以适应学科发展的新潮流。社科院文学所主编的《唐诗选》是“文革”后影响最大的唐诗选本，在选诗数量、选目、注释等方面，均需修订。刘学锴师的《唐诗选注评鉴》（中州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集选诗、注释、集评、鉴赏四者为一炉，是一部以渊深的学识从事唐诗普及工作的杰作，但选诗数量有限，有待进一步扩充。新编的唐诗选本数量偏少，应当出版分体裁、题材、分阶段（如初盛中晚）的

大、中小型选本，百花齐放，适应海内外唐诗爱好者的需要。应当大力推进当代唐诗选本的编纂工作，更需要将唐诗选本译成外文，在海外传播。

唐诗学作为一门学科，其学科体系已基本建立。从事唐诗学研究的目的是，自然是传承文明，服务社会，贴近生活，贴近人民，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全社会唐诗艺术欣赏的品位，建设美丽中国，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要以文献为基点，作品与理论结合，理论与生活结合，既坚守文学本位，又能立足于广阔的文化视野，守正创新，要大力加强学术创新与学术史建设，推出原创性成果，撰写唐诗文献学史、唐代诗歌史、唐诗艺术史、唐代诗论史、唐诗接受史，在语言与文学结合、文献与理论共进、普及与提高共赢的新起点上，构建唐诗学学科体系，从而使唐诗学既有宏观的整体的理论建构，也有具体的个别的学术创新，成为视野开阔、立论宏通，而又新见迭出的专门之学，使唐诗学成为新文科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要加强唐诗学的教材建设，形成相对完整的唐诗学教材体系，将唐诗学这一极富民族特色的学科不断发展壮大，发出更强的中国声音，并将这种声音传播到世界各地，为人类精神文明与进步服务。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唐诗学研究”(12 & ZD15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2版。

[2] 《全唐诗》卷676,彭定求等编,第7747页,中华书局1960年版。

[3] 陈造:《江湖长翁集》卷31《题韵类诗史》,明万历四十六年仁和之藻刻本。

[4] 张鼎:《重刊诗林广记序》卷首,明弘治十年张鼎刻本。

[5] 《中国诗学大词典》,傅璇琮等主编,第3页,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6] 查清华:《唐诗学研究的继往与开来——“唐诗学书系”出版座谈暨学术研讨会综述》,《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12期。

[7] 万曼:《唐集叙录》“出版说明”,第1页,中华书局

1980年版。

[8] 陈伯海:《唐诗学书系》“总序”,《唐诗书目总录》(增订本),第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9] 周采泉有《杜集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郑庆笃、焦裕银、张忠纲、冯建国有《杜集书目提要》(齐鲁书社1986年版),孙微有《清代杜诗学文献考》(凤凰出版社2007年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增订版),孙著增订本共收杜集文献500余种。

[10] 安徽师范大学韩震军教授的《唐诗纪》研究,值得关注。

[11] 陈尚君:《唐诗学研究的总结性著作》,《学术月刊》2016年第10期。

[12] 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上世纪80年代引入大陆,其书对诗歌文本作了仔细的艺术分析,其文本细读之法,对当时学界尤其是年青一代学者深有启发。

[13][14] 严羽:《沧浪诗话校释·诗辨》,郭绍虞校释,第26页,第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15] 袁枚:《随园诗话》上册,第7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16] 陈文忠:《走出接受史的困境——经典作家接受史研究反思》,《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17] 参见袁行霈《中国文学史》总绪论,第一节《文学本位、史学思维和文化学视角》的相关论述。《中国文学史》第一卷,袁行霈主编,第4—7页,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

[18]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路》,《新华每日电讯》2022年4月26日第4版。

[1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第1002页,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20] 李定广、陈伯海《唐诗总集纂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8月版)统计存世者有400余种。

[21] 参见丁放《〈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与明代唐诗学》,《文学评论》2017年第1期。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赵培